

冷战结束前柬埔寨华人社会变迁与华文教育发展史述略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ambodian Chinese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ambodia in the Cold War Era

杨新新^{*}

(YANG Xin-Xin)

摘要

受资料来源与认知视野的限制，目前学界对冷战结束前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变迁历史及其与柬埔寨华人社会变化之关系等问题缺乏专门的讨论。鉴于此，本文拟在尽量收集各类关于柬埔寨华文教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相关成果与研究者赴柬埔寨实地调研获取的田野口述资料，尝试对冷战终结前地区国际关系、柬埔寨国内局势以及本地华人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如何作用于柬埔寨华文教育之发展演变历史作重新系统地分析与检讨，以期能使后来者对相关议题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与同情。

关键词：柬埔寨、华人社会、华文教育、冷战期

Abstract

In the absence of data and understanding,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ambodia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cold war era. Based on documents and oral materia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ambodia by analysing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ountry,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concerned.

Keywords: Cambodia,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education, cold war era

一、前言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类似，作为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文教育，目前其在柬埔寨国内已自成体系，并在柬埔寨国家教育与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 杨新新博士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电邮地址：yangxinxin870325@126.com

（野泽知弘 2012：66）。而对于柬埔寨华文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早自上世纪50年代初，柬埔寨王国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后未久，中外学界便在有关文献收集整理与实地口述田野的基础上，就其建立历史、发展现状及其与华人社团关系等议题作了初步有益地探索。¹

然而随着1970年代以来，东西冷战对峙加剧，印度支那地区局势与柬埔寨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尤其1970年柬埔寨政变与红色高棉（Khmer Rouge）运动兴起后，大规模“排华”浪潮涌现，使得柬埔寨华人社会受到极大冲击，非但延续数十年的柬埔寨华文教育传统被迫遭到中断（谭晓健、余建忠 2006：26），且相关学者亦再无机会赴柬埔寨国内进行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工作，学界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分析与讨论由此亦转入停滞状态（陈世伦 2016：28）。直至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印度支那地区与柬埔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柬埔寨华人得以恢复合法身份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恢复元气，再次建立起华文学校，各方面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后，中外学界方才重新开启了对柬埔寨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的研究。

就1990年代以来各方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一般以教育学的立论视角出发，从柬埔寨华文学校的内外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模式、师资生源水平、教材使用情况等诸多面向，对“后冷战”时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评估，²并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就“后冷战”时期华文学校的功能效用机制及其与华人社团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部分有益地探讨。³不过，或可能因受到资料来源的限制，⁴以及学科与认知视野的影响，对于冷战结束前柬埔寨华文教育“跌宕起伏”的命运如何受到印度支那地区国际局势变化、柬埔寨国内政策变动以及柬埔寨华人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等过程之影响，除少数学者有部分涉及外，专门系统的分析与讨论目前可谓尚付阙如。⁵

¹ 参见黄雄略（1944）、苏子（1954）、张文和（1956）、黎庄（1958）、苏子（1959）、华侨编纂委员会（1960）以及Douglas P. Murray（1964）、Willmott W. E.（1967）、Willmott W. E.（1970）等研究中对柬埔寨华文教育叙述的相关章节。

² 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江河（1996）、邢和平和彭晖（1997）、洪群（2003）、侯瑜（2006）、白昱（2008）、肖寒（2012）、符气志（2013）、夏诚华（2014）、盘世卫（2017）。

³ 有关讨论可见Shihlun Allen Chen（2015）、张悦（2012）、罗杨（2017）、陈世伦（2017）。

⁴ 事实上，经过1975年以来红色高棉运动与亲越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对华人的打压与排斥，一方面，柬埔寨国内关于冷战结束前本地华人历史与华文教育的相关报刊、档案等文献记录不但大多或“付诸一炬”，或被迫丢弃遗失，且柬埔寨本地华人目前主要精力在于从事“商业经营”，缺乏保存“社团经营”、“社区发展”相关历史文件的“意识”（陈世伦 2016：34-35）。因此，相关纸质资料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经历过冷战前华人社区与华文教育“兴衰起伏”过程的本地老辈华侨华人不但人数有限，且部分老侨不愿谈及过往经历，这也造成研究者在口述资料获取上的困难与不易。因此，资料来源的限制与缺失，可能是目前研究者讨论分析冷战结束前柬埔寨华文教育史的最大“障碍”。

⁵ 周聿峨（1995）、郁汉良（2001）、黄明焕（2006）、林志忠（2008）、张西平（2009）、蔡昌卓（2010）等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论著的探讨，或多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或少有相对深入的分析，也仅是侧重于从诸如柬埔寨华社人口变迁、中国与柬埔寨国家关系变化等面向出发，讨论其如何作用于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建立之过程。且就研究的时间维度而言，此类研究，又多侧重于对冷战结束后柬埔寨华教历史的分析。因此，整体而言，这为后来者在相关问题上的拓展提供了可供置喙的余地。

鉴于此,本文拟在尽量收集各类关于柬埔寨华文教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相关成果与研究者赴柬埔寨实地调研获取的田野口述资料,尝试对冷战终结前地区国际关系、柬埔寨国内局势以及本地华人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如何作用于柬埔寨华文教育之发展演变历史作重新系统地分析与检讨,以期能使后来者对相关议题有更为深刻地了解与同情。⁶

二、柬埔寨华人社会与华文教育的发轫

按照已故东南亚侨史学者姚楠先生的推测,早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完成对南越等地的征伐占领后,便可能已有“徙谪”岭南的中原汉人先民“流寓柬埔寨”等地(黄雄略 1944: 3)。两汉三国以后,随着番禺、徐闻等地与中南半岛海上航路的建立(班固 1962: 1670),吴国主孙权即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等赴扶南等地“南宣国化”(许永璋 2004: 25-30)。与此同时,位于今天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的上丁省(Stung Treng)又有孔明塔寺遗迹,而该省珠山附近另有“古喇族”人,自称“孔明南征部队之后裔”(张文和 1956: 107),据此或可推知,那时似另有华人先民,因蜀国政治变故之关系,迁居高棉。魏晋南北朝以来,至隋唐以降,由于柬埔寨吴哥王朝的兴起,以及中国王室、贵族对海外“方物”需求的加剧,使得柬埔寨与中国间的往来互动,不再限于官方间的“朝贡”贸易,而扩至有私人经营性质的“一般性贸易”和交往(赵和曼 1981: 70-71)。受益于此,当日可能不但有华人先民徙迁于柬埔寨地区(许肇琳 1982: 127),且据相关史料考证,另有华人先民可能已在吴哥王朝首都吴哥城等地定居,并“开设了极为繁华的商店”(李绍辉 2010: 62)。

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直接文献资料的缺乏,与华人先民迁移至南洋其他地区之情况类似,后来者关于宋代以前华人迁居柬埔寨的叙述,多以间接证据推论而来(陈碧笙 1983: 155)。至于有关华人先民定居柬埔寨的直接文献材料,则出现于宋代前后,尤其见诸于十世纪下半叶以后。一方面,由于受到内亚(Inner-Asia)地区游牧族群不断南侵的影响,中原地区汉人大族世家不断南迁,华夏文明社会经济重心向

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主要集中讨论冷战结束前国际地区关系、柬埔寨国内局势以及华人社会内部变化等因素对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变迁历史的影响,一方面,如前所述,这当然系因既有研究对此缺乏专门系统的分析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前后,柬埔寨华人社会、华文教育面临的内外环境大相径庭。尤其冷战结束后,不但使柬埔寨国家已再无此前面临的重大外部国际环境之威胁,其国内发展也得以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方天建、何跃 2013: 30-40)。且柬埔寨华人经过1970年代以来20余年的战乱与被压迫,已基本融入到本地高棉社会之中。而冷战后,柬埔寨华文教育本身,也不单只限于招收华人子弟就读,其已全面向柬埔寨本地族群学生开放,并面临着国际学校、市场化机制以及区域分化、内部路径差异等问题的冲击(刘舒凌, 2002)。因此,1990年代以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重建与发展历程,固然也受到地区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中国日益崛起与中柬两国国家关系、商贸往来变化的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柬埔寨国内局势与本地华人社会等内部结构性因素已较之从前有了不小变化。于是,冷战终结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新变化与发展“命脉”,很大程度上或可主要视作柬埔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结构因素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故而,以1990年代初冷战的终结为界,在此前后的柬埔寨华文教育应被认为是两个情势完全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对其则当做分别之探究与检讨。而对于后一阶段的问题,即1990年代至今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变化与新动态,论者未来将有专文进行分析。囿于论题限制,此处不作展开分析。

南转移（斯波信义，2012）。另一方面，与外部世界陆上交通路线的被迫中断，使得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着力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海上航行技术的发展（孙广圻 1984：69-84），促成中国商人逐步掌握了此前由波斯、大食商人垄断的南海航路（周中坚 1985：71），华人先民由此往来真腊等地日益便利，定居当地者与日俱增（陈元靓，2011）。加以印刷技术的发展，汉字书写系统的扩散（清飏 2001：151-156），这一切最终促成了此后关于华人先民定居柬埔寨直接记录的产生。

从这一时期前后，汉字文献记录中的相关描述来看，往来并定居于柬埔寨等地的华人先民，主要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们中除少数为官方使节与访学的僧侣外，为数众多者为“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的商贾。他们在柬埔寨定居后，利用真腊王国的“庇护制度”及其对外商贸的需要，与吴哥王室交好，逐步掌握控制了本地的工商业，专为真腊王国上层贵族服务，并形成了特定的木造围城的“唐人”聚落（周达观 2000：178-181）。而从吴哥等地出土的考古材料，也证明13世纪前后的真腊王国确有一定规模的华人专为其王室贵族服务（全裕辉 2004：30）。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从人员规模，亦或是就迁入动机与性质而言，两宋时期以后，往来并定居于柬埔寨的华人先民，较之从前已发生重大变化，其已然成为柬埔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尽管从以上论述可以确定，至少在中国的宋代前后，便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先民开始定居柬埔寨等地，并初步形成华人（当日谓“唐人”）聚居区。然而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轫，却要晚于这一时段，迟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方才开始产生。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由于明清时代以前，中原汉人文化在华南、东南沿海地区的传播力度有限，影响主要限于城市和交通沿线地区的少部分上层精英群体（徐承恩，2015）。远赴柬埔寨等地“住番”的华人先民，则多以“擅舟楫”、不通文墨的“俚僚”、“越人”群体居多（朱彧，2007）。故其，缺乏教育子弟的必要见识与相应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⁷

另一方面，17、18世纪以来，由于暹罗、安南等国对柬埔寨的不断压制（霍尔 1982：519-527），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下柬埔寨”）等的开发，以及中国国内明清鼎革的政治变故，中国东南沿海华人先民大量涌入柬埔寨金边（Phnum Penh）等地，由此柬埔寨的华人社会亦得以基本成型（王士录 2002：49）。而这批南迁至柬埔寨的华人先民，由于受明代以来中原王朝在华南、东南沿海地区的儒家礼仪规范建构行动等的影响，“风俗礼教”逐渐向华夏文明“看齐”（科大卫，2009），不但认识上对出洋子弟的教育以及“祖先文化”的重视胜过从前，且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大约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柬埔寨华人先民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帮会制为主的柬埔寨华人社团逐步开始形成（Willmott W. E. 1970：11）。柬埔寨华人先民在完成修建“会馆、祠堂、庙宇”的基础上，为“着眼后代前途”计，开办了“私塾、义学或学堂”

⁷ 当然，也不排除，在宋代甚至更早之前，定居柬埔寨的华人先民，出于交往方便的需要，可能办有小规模教授中柬两国语言的教育机构等。盖因此后无论是中柬之间的官方往来，亦或是民间交通，其间皆可见不少华人“通事”的身影，由此或可推想此种情况的存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此种机构的存在，其目的亦终非为传承中华文化，教育华人子弟，故亦不能将之完全与后来的“华文教育”等而视之。

等传统教学机构，以传承延续中华文化，教育本族子弟（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22）。这也成为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轫与滥觞。

而从柬埔寨华文教育兴起后的实际办学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柬埔寨的传统华文教学机构以私塾教育形式居主，其中多数由家境条件宽裕者从国内延聘师资设立，另外亦有个别南来的“饱学之士”单独“开馆”办学。部分与帮会关系密切的私塾，更是得到相应华人社团的各项支持（梁明 1988：39）。由于当日柬埔寨各私塾学堂开设之目的，主要在于使出洋子弟不忘“民族传统文化”，因而其主要使用的教材以《三字经》、《千家字》、《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居主，并辅以珠算、书信等实用科目（杨豪 1999：1）。同时，由于此时各私塾学堂的塾师、子弟皆为东南沿海所迁来者，故在授课时各私塾学堂多采粤、闽两地方言教学，这也成为此一时期传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一大特点（蔡振裕，2001）。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迁而来的华人遍布柬埔寨各地，从事种植与工商业等工作（西莫尼亚 1963：17），传统华文教育在柬埔寨亦发展至“顶峰”，几乎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办起了私塾学堂，以教授华文（蔡昌卓 2010：46）。

三、重获独立前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变化与现代华文教育的兴起及发展

柬埔寨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华文学堂的发轫，则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人殖民柬埔寨以后（周胜皋 1969：87）。而柬埔寨新式华文学堂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前后出现，则主要受到印度支那地区、柬埔寨国内局势变动，以及中国国内情势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左右。事实上，就当日印度支那地区与柬埔寨国内的局势而言，由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与柬埔寨等地建立殖民统治后，华人经过此前的长期努力与发展，不但人口为数众多，且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绝对优势（吴凤斌 1993：61）。法国殖民当局基于经济利益与维持统治的考虑，沿用了其在安南的治理策略，对华人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实行帮长制度，进行间接管理。⁸由此也形成了柬埔寨社会所谓“柬族政治——华人经济”的“二元精英传统”（Shihlun Allen Chen 2015：229）。这无疑使华人社会获得了相对较大的自治空间，为华人学校等华人组织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就当日中国方面的情势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国内政治社会变动较为激烈的时期。随着海通时代的到来，清王朝逐步从封闭转向开放。中国的官府与士人精英们对移民南洋等地的华人的看法亦发生重大转变，他们不再将之视作“自弃王化”、背祖离宗的“天朝弃民”，而认识到其可能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孔飞力，2016）。此后，在认知观念“改弦易辙”以及国内新式教育创办浪潮的作用下，为“发扬”海外华人及其子弟的“爱国之心”，并“扩其知识”，使

⁸ 所谓帮长制度，即法国殖民者为方便对印度支那等地华人移民的管理，要求华人按照移民前在中国所属的不同地域与方言群体（speech-groups）组成不同的帮，并选出帮长，以协助殖民者当局开展收税、维持秩序、登记新移民等工作。而另有说法认为，印度支那地区华人的帮长制度，并非法国人首创，而是其借鉴了安南王国、柬埔寨王国对华人、外国人的管理方法。相关讨论见（Willmott W. E. 1970：11）。

之“操业日精”，更好为朝廷效力，清廷政府开始在南洋等地推行新式华侨教育（别必亮 2001：62-68）。而随着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进步人士“流落”南洋，他们的相关活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南洋等地现代新式华侨教育的发展（庄国土 1990：23），并使这一风气逐步影响到了印度支那地区与柬埔寨（王士录 2002：50）。因此，正是在上述两方面内外条件变化的刺激下，柬埔寨华人社会内部部分有识之士最终认识到华文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新式华侨教育的创设工作。⁹这之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遂进入一新的“世代”。

自20世纪初柬埔寨华文教育由“传统”开始向“现代”过度的初期，柬埔寨的新式华文学校主要集中于金边、暹粒（Siem Reap）、马德望（Battambang）等大城市以及华人口较多的城镇，至于华人口不多的城镇及部分乡村则“仍保持旧私塾”（黄明焕 2006：10）。而就柬埔寨现代华文教育发轫时期的各华文学校的办学情况来看，这类新式华文学校，多由华人帮会、同乡会等华人社团办理（柬埔寨潮州会馆 2014：215）。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一度对华人社会与华人团体等之管理较为宽松，然而由于担心中国维新派、革命党人在学校内的激进活动（王士录 2002：50），法国殖民当局此后开始部分加紧对此类华文学校的管理，不但要求其必须向相关机构报备注册，且学校在开设中文教育课程之外，另需加开一定数量的法文、柬埔寨文等课程（黎庄 1958：16）。由于新式华文学校开办初期，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学校学费收入低，办学经费及办学场地有限，因此学校又多由此前之私塾学堂或锣鼓班等文化机构改办而来（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10），并多租借民房作为教学场所（柬埔寨民生中学，2012）。学校不但教师人数有限，少则1、2人，多则3、5人，且学生数量最多者亦不过百余人，整体教学水平不高，办学环境较为相对“恶劣”（白昱 2008：20）。

柬埔寨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初期的“困难”历程大约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主要殖民国家将精力转移到欧陆战场，进一步放松对南洋等地华人移民的管制，与东南亚其他地区情况类似，这一时期，柬埔寨华人不但在经济上实现了较程度的发展（王文元 1979：17-18），且移民人口规模与数量也在不断提升（杜敦信、赵和曼 1988：323），华人社会对新式华文学校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前后，初步完成中国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旗号下，加强对南洋等地新式侨校的支持（别必亮、田正平 1997：36）。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务部门的帮扶与指导下，柬埔寨的新式华文学校，不但数量上有大幅度的增加，各华人社团、帮会皆办有新式学校（柬华理事总会文教组 1994：1），且其开始取代此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私塾学堂等，由金边、暹粒等大城市扩展至普通城镇与乡村（刘真 1973：180）。而就学校之整体发展而言，这一时期，柬埔寨新式华文学校的各方面建设，也多开始向中国国内学校看齐，非但大量延聘因各种诱因南迁本地的中国知识精英担任校长、教师，使用中国政府统一规制的中正版教科书（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1998：94）。同时在学制上也仿效中国学校，设立6年制小学、3年制初中，改用普通话教学。部分学校甚至设立了专门的女子学部，并免收部分贫困家庭学生的学杂费用（周胜皋 1969：87-88）。

⁹ 关于柬埔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华文学校，研究界一般认为是1901年潮州籍华人在柬埔寨磅湛（Kompong Cham）三州府成立的新民学堂。相关分析见郝彦忠（2000：66）。

尽管得益于国际地区局势的变化以及本地华人社会经济水平上的不断提升,经过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发展,到1930年代中期前后,柬埔寨共有华文学校95所,学生4,057人,教师123人,新式华文教育已遍布柬埔寨全境,且其整体状况较之此前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刘真 1973: 180)。不过,考虑到当日各华文学校多属各华人帮派、社团“独立运营”,其创设学校之目的,除有教育子弟、传承文化的考量外,更希望借创设新式华文学校这一行动,巩固并扩充亚群体(sub-groups)华人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竞争资本。故而这一时期的新式华文学校的创设与发展,多有“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此外,由于1930年代以前,南迁柬埔寨之华人,多以家境贫困者居多,并以“求生存”为首要目的,少有文化程度较高之士。因此,华文学校师资数量缺乏且质量有待提供等问题也一直未获解决。¹⁰然而,无论如何,20世纪20、30年代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相对发展与“繁盛”,却也为其未来之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办学和教学经验”,并为之后柬埔寨华人“保持华文教育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张西平 2009: 290)。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一次受到外来局势变化的冲击与影响,约发生于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人的南侵,柬埔寨与中国东南沿海等地的交通往来一度中断,在外来压力与柬埔寨本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法国殖民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柬埔寨华人的管制,¹¹华人不但在经济与商业上遭受重大损失(史如林 1985: 44),且随着1941年8月日军进驻柬埔寨以后,一段时期内华人新移民入境柬埔寨亦受到限制(Willmott W E. 1970: 6)。以上这一切,无疑也阻碍了柬埔寨新式华文教育自1920年代以来“阔步前进的步伐”。战争期间,多数华文学校由于本地华社经济困难、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对海外侨校的津贴,而不得不停办(柬埔寨民生中学, 2012)。少数得以坚持的学校,则或因校舍遭炮火炸毁(柬埔寨铁桥头柬华理事会华明学校 2016: 1),或因就读学生锐减,而不得不降低办学层级与规模(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 12)。直至战争结束后,柬埔寨华文教育才得以进行恢复重建。

事实上,从194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1950年代初柬埔寨王国重新独立以前,一方面由于柬埔寨国内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法国殖民当局在战后元气大伤,再度放宽了对印度支那等地华人移民的管理(许梅 2000: 12),并取消了延续数十年的帮长制度,将柬埔寨等地华人的自治管理权统一划归新成立的中华会馆管辖(庄国土 2004: 2)。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内国共内战爆发,大量华人新移民因政治、经济等各种诱因,被迫涌入南洋、印度支那等地,这不但极大地促成了柬埔寨华人社会在战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周中坚 1996: 25),且有益于战后柬埔寨各华文学校的加速重建与发展。

从这一时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势来看,柬埔寨的各地华文学校不但基本得以重新规复到战前的建制,且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与规模较之从前亦有了不小提高。多数学校非但由战前的“私立”学校改为由华人社团领导的“公立”学校(傅曦、张

¹⁰ 作者于2018年2月15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蔡迪华会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蔡宅。录音编码: 005。

¹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柬埔寨,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以及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方面并未完全废除法国殖民者的统治,而是允许其继续存在。因此,二战期间,柬埔寨可谓系由日本与法国两方面双重统治。相关讨论见王士录(1994: 113)、David Chandler(2007: 201-206)。

俞 2000: 34)，办学层级由小学扩至初级中学，基本解决了此前存在的经费不足、教学场地缺乏等硬件问题。¹²同时随着大量文教精英从中国南来柬埔寨等地，战前本地华文学校面临的教学与管理人才缺乏的软体困境亦部分得到克服，学校教学水平有了显著提供（柬埔寨民生中学，2012），少数华文学校更是因学生数量的激增，而办起了分校（柬埔寨潮州会馆公立端华学校 2016: 1）。

当然，尽管二战结束后到柬埔寨再次独立前，由于内外条件的变化，柬埔寨华文教育总体上实现了较好的复苏与发展。然而，这却不表示这一时期柬埔寨的华文教育并非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受到中国国内国共两党权势之争引发的“海外华侨争夺战”之影响，约从1940年代中后期开始，此种争斗蔓延到柬埔寨华文教育领域，部分柬埔寨华文学校“深陷左右之争的政治旋涡”（杨豪 1999: 13）。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由于多数柬埔寨华文学校“侨校”的性质，柬埔寨华教界左派、右派之争日趋激烈，众多有影响力的华文学校之董事会成员、校长以及教员等更替频繁，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与发展（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 10）。直至柬埔寨重获独立后，其在外交上不断与中国大陆交好，此种局面才最终以亲国民党势力逐渐从华文学校中退出，“学校改为校委制，各方势力逐步达成平衡”而告终。这之后，柬埔寨华文教育再次逐步转入发展正轨，进入后来者谓之于“黄金期”（柬埔寨潮州会馆公立端华学校 2016: 1）。

四、重获独立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新动态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黄金期”

华文教育之所以在柬埔寨王国重获独立后被认为进入了所谓发展的“黄金期”，主要与1950年代初以来印度支那地区局势变化以及中柬两国相对“特殊关系”的形成有关（翟强 2013: 14）。尤其随着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出于共同的国际地区利益关系的考虑，中柬两国关系不断变化调整。柬埔寨政府在维持与美国等外交关系的同时，亦不断向中国大陆方面靠拢（David J. Steinberg 1957: 159），以期实现其在“左”、“右”两大政治势力间保持“中立”、“平衡”（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 1990: 59）。中柬双方遂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各方面合作日益密切（许肇琳 1995: 296）。中柬两国政府间的不断交好，使得20世纪50年代前后东南亚境内为数众多新兴民族国家爆发的“排华”浪潮此时并未波及柬埔寨，这为柬埔寨本地华文学校在这一时期内的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空间。

与此同时，由于经过上百年时间的积累与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柬埔寨重获独立前后，华人不但遍布柬埔寨全国各地城镇与农村，与本地高棉民众和睦相处，成为柬埔寨国内重要族裔势力之一（威·贝却敌 1958: 6）。且由于华人主要从事工商、贸易、出口等工作，在柬埔寨本地经济结构中占有近乎“主导”的地位（苏子 1959: 31-32）。本地华人社会的“欣欣向荣”（温北炎 2003: 53），以及华文学习需求的高涨，无疑也为这一时期华文教育在柬埔寨的“向前推进”提供了相对便利的内在条件。¹³因此，

¹² 作者于2018年2月13日对柬埔寨金边端华中学校长杨金义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端华中学校长办公室。录音编码：002。

¹³ 作者于2018年2月18日对柬埔寨金边客属崇正学校校长周洁明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大金欧（Takhmau）周宅。录音编码：008。

在以上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下，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柬埔寨独立以来，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朗诺将军（Lon Nol，1913-1985）发动政变前后，柬埔寨本地华文教育较之从前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从这一时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不但学校数量、在读学生人数与学校办学规模等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到1960年代“鼎盛时期”，全柬共有“从小学到高中的各类华文学校”两百余所，学生五万余人（柬华理事总会文教组 1994：1）。且学校各项办学硬软件条件亦有了不小变化，不但扩建了校舍与教室等教学行政场地，并修筑了篮球场、羽毛球场、沙池、水磨石滑梯等现代教育设施（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34）。同时，由于受印度支那战争之影响，越南西贡等地部分家境丰裕、文化水平较高的华校教师的涌入，中国大陆援助教师的派来，以及柬埔寨政府实施华文学校教师执业证考试制度，¹⁴使得学校此前师资数量不足且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得到进一步改善，甚至出现部分年纪较大、教学水平有限的老教师“不得不四处奔波找工作”的现象（杨豪 1999：18）。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影响力在柬埔寨不断提升，以及国民党势力从本地华社的逐步退出，柬埔寨华文学校无论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亦或教学理论指导思想以及教材选用等问题上，皆出现“去国民党化”，并积极向中国大陆靠拢等倾向。¹⁵学校不但选派校长、教师组成“回国观光考察团”，赴中国大陆各地实地考察调研新生政权推行的各种新教学方法，并在返柬后，结合本地华文教育的实际状况，调整修改本地华校的教育模式（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30）。同时，为消除本地华社内部各群体间的隔阂，规范本地华人子弟的中文应用标准，提高其华语文学习、使用水平，这一时期柬埔寨各华文学校，不但逐步统一了教材的使用，价值取向相对中立、知识结构更为专业、较适应柬埔寨本地侨情的新加坡“联营版”以及柬埔寨本国编辑刊印的“柬华版”教材取代了此前长期占据柬埔寨各华文学校的“中正版”教材，成为本地各华文学校的教科书（黎庄 1958：94-96）。且受当日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运动的影响，柬埔寨各华文学校又开始积极全面推行普通话教学，¹⁶以促成本地华文教育向良性与正规化方向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受此时中国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左翼”文化思潮等的影响，柬埔寨华人社会，尤其文教界整体风气较为“进步”（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6）。就其对华文教育的建设而言，他们除致力于金边等地既有华文学校水平的提升外，亦多注意对贫困地区华人子弟的帮助以及边缘省份华文学校的创设与发展（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41）。而本地各华文学校学生在“各类进步思潮”

¹⁴ 作者于2018年2月16日对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前副会长、文教师训处主任郑棉发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郑宅。录音编码：007。

¹⁵ 作者于2018年2月13日对柬埔寨客属会馆罗世兴会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客属会馆办公室，录音编码：003。事实上，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柬埔寨端华、崇正、民生等华校开始率先向中国大陆方面积极靠拢，到1960年代初期，金边除中正、三民等少数国民党学校外，多数华校基本转向靠近中国大陆。而在金边以外地区，由于中国大陆使馆影响力有限，国民党地方支部较为活跃，故尚有部分华校“心向台湾”（周胜皋 1969：89）。

¹⁶ 作者于2018年2月15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蔡迪华会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蔡宅。录音编码：005。

的“鼓动下”，“学习中文功利心相对较少”，毕业后多“以到乡下艰苦地区担任教师等为荣”（杨豪 1999：17-18）。因而，这使得此一时期内，金边等大城市以外地区的华文学校不但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学校几乎“遍布全柬各省市和县乡镇”（江河 1996：26）。且其在教学水平上“并不输给金边等地大华文学校”，甚至部分“边缘省份”华文学校也办起了具有高级中学程度的“专修班”，与金边等地各大华文学校展开了生源“争夺战”（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4）。足见这一时期柬埔寨华文教育除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高外，此前存在的不同区域间华文学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亦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当然，虽然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自柬埔寨王国重获独立后一段时期内开始，柬埔寨本地华文教育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并朝着良性与正规化方向“稳步前进”，然而这却并非表明柬埔寨华文教育在此时的发展演进历程中未面临任何难题与困境。事实上，由于重获独立后，柬埔寨政治精英们出于推行“柬化”政策，建构新民族国家的考虑，一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法案，加强了对外侨国籍归化、移民迁徙流动等的管理，并逐步削弱、取消了颇具历史传统的本地华侨社团帮长制度以及中华会馆等的自治权力（Willmott W E. 1967：79-80）。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大了对本国“柬族”产业以及高棉籍雇员等的扶植力度，并限制外侨特别是华人所能够从事之职业，以打压在经济领域占有绝对优势的华侨、越侨等的生存活动空间（苏子 1959：111）。同时，柬埔寨政府还收紧了对本国外侨学校特别是华文学校的管理，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强制规定华文学校缴纳“牌税、营业税和溢利税等”，并要求其必须向柬埔寨相关教育行政机构登记注册，大幅度增加了柬文课程在华校实际教学中的比例，且关闭了一批资质条件不符合柬政府规定的华文学校（Douglas P. Murray 1964：83）。无疑，柬埔寨政府上述措施的出台，令大批华商、华工不得不停业、失业，部分影响了本地华人经济社会的发展（廖小健 1996：37），也对主要依靠华社自发创办的本地华文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¹⁷

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柬埔寨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打压本地华社与华文教育发展的策略，并对之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但总体而言，在当日中柬两国关系不断交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虑到与中国大陆的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华人在本地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柬埔寨政府对相关法规、法案的执行却多采取“寓引导于管制”的温和方法（谭实等 1985：195-196）。这使得柬埔寨政府的上述“柬化”与“民族主义”政策，并未对本地华人社会，尤其未对本地华文教育造成直接严重的后果。华文教育此时在柬埔寨的影响力，不但随着柬埔寨国内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中柬两国关系的发展与日俱增（江河 1996：26），就连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1922-2012）亲王也将王子送往华文学校学习中文（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18）。且本地华商、华人领袖在帮长制度取消后，又通过

¹⁷ 事实上，柬埔寨重获独立后，收紧了接受移民的条件，同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移民政策也发生相应变化，不再鼓励并允许人口自由向外迁徙。到1950年代中后期，无论迁来或迁出中国大陆等地的华侨华人移民基本趋于停滞，这一方面使得柬埔寨的“华侨经济”开始向“华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也部分影响到了本地华文学校的生源与招生等问题（全裕辉 2004：30）。

成立“宗亲会”、“互助社”等社团组织，继续为华文学校的建设发展提供各类支持（罗杨 2017：62-63）。而为数众多的华文学校更是在柬埔寨政府强制规定提高办学标准后，被迫不断改进各项内外环境条件，使得学校无论教学水平亦或正规化程度较之从前都有了不小提升，甚至吸引了越南、老挝等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前来就读。¹⁸到1960年代中后期，金边地区的著名华文学校端华中学，更是在本地华社的支持下，着手于华文高等学府“端华大学”的创建（刘海棠，2015），以全面提升本地华教水平。由此可见柬埔寨重获独立以来，本地华文教育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张俞 2002：166）。

五、20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后柬埔寨华人社会、华文教育的重创与复苏

柬埔寨重获独立以来到冷战结束前，柬埔寨华文教育因内外局势变化，遭到重创，并最终被迫全面停止办学，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前所述，尽管自1950年代中后期始，随着中柬两国关系的不断交好，柬埔寨华社与柬埔寨华教界受中国大陆“左翼”政治文化等之侵染，总体风气与氛围一度相当“进步”、“优良”，并有益于柬埔寨华文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与发展。不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受中国大陆“左翼”政治文化，尤其受196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愈发激进的“左翼”革命浪潮的波及（侯瑜 2006：16），到1966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选集、“红宝书”等风行于华人较为集中的柬埔寨主要城市与华文学校等。¹⁹在中国大使馆“造反派”与柬埔寨“柬中友协”等“极左份子”的“鼓动”与“干预”下，柬埔寨华人社会整体转向“极左”路径，不但华文报纸，大肆宣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理论，干涉、指责柬埔寨内政（周中坚 2003：49）。为数众多的华文学校师生，更是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奔赴得到中共支持的“赤柬解放区”，²⁰参与“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革命暴动”，由此也引发柬埔寨政府与西哈努克亲王等的不满（西哈努克 1997：161-164）。

1967年9月13日，在本地华人社会受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影响愈发严重，柬埔寨华人越来越“激进”、“左倾”，柬埔寨当局对华文报刊、华文学校“几近失控”，柬埔寨政府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中国大陆官方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以“柬中友协”更名为“中柬友协”事件为导火索，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查封全柬境内所有华文报纸，撤回了柬埔寨驻华使馆官员，并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柬埔寨不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康矛召 2000：177-178）。同时，考虑到平衡“左”、“右”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

¹⁸ 作者于2018年2月15日对柬埔寨（中国）广东商会秘书长郑汉贵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蔡宅。录音编码：006。

¹⁹ 作者于2018年2月16日对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前副会长、文教师训处主任郑棉发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郑宅。录音编码：007。

²⁰ 从现有的资料可知，“赤柬”即柬埔寨（高棉）共产党组织，成立于1951年，并于1968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北越等的支持下，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逐步控制了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的所谓的“解放区”。而上世纪50-7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除在官方层面同柬埔寨政府交好，积极与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公开表现支持“弱小民族国家独立、自由”外，另一方面，其又在“输出革命”的旗下，暗中支持印度支那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暴力革命。由此亦可见中国大陆当日在外交上的“两面性”及其对柬埔寨与印度支那等国的影响力（Michael Vickery 1986：23-24）。囿于论题限制，此处不作赘述。

柬埔寨政府虽未直接出台打压华文学校的政策，但对学校中政治面目“极左”且煽动学生游行示威、参加“赤柬”革命行动的“主谋份子”予以了驱逐出境（李国卿 2000：231-232）。而这也成为柬埔寨重获独立以来华文教育“发展良好的势头”，因国际地区局势变化、本地华社变动等影响，逐步受到冲击，并彻底走向停止的滥觞。

事实上，柬埔寨华文教育在1970年代前后，实际遭到限制、打压，并开始被迫停止办学，始于朗诺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权之后。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后，中南半岛等地区国际局势以及柬埔寨内部政治经济形势愈发复杂，深陷“左”、“右”两大政治势力权斗的旋涡，西哈努克亲王及其领导下的柬埔寨政府已然无法在美、苏、中等大国博弈间继续保持“中立”路线（潘一宁 2010：25）。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默许北越使用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运送武器并强制终止了“国际委员会”在柬埔寨境内的监察活动后，以朗诺将军为首的柬埔寨“右翼”军人集团，乘西哈努克赴法国疗养之机，在美国方面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的统治（Kenton Clymer 2004：20）。因朗诺将军建立的政权，抱持“反共亲美”的态度，故其对以“左翼”居主、受中国大陆影响极深的本地华人社会、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与“压制”的态度（傅曦、张俞 2000：34）。

在朗诺将军的威权统治下，柬埔寨军政府以“华人破坏高棉文化与道德”为借口，不但强制查封了“左倾”严重的华人社团、华文学校等机构，华人商店亦被要求禁止悬挂华文招牌。同时，柬埔寨当局为加强对华人的控制，还另专门成立了“柬埔寨华人联合会”，一方面强化对华人的监视，另一方面又强迫华人向政府捐款，并对华人社会开征特别税。在以上政策施行的影响下，柬埔寨国内掀起有史以来第一次“排华”浪潮，本地华人社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部分华商商店被毁，少数华人遭到本地高棉人的攻击甚至杀害。柬埔寨大部分地区华文学校被迫公开停止办学（孙华 1988：16）。柬埔寨华文教育遂面临着自二战结束以后又一次重大挫折与危机。

当然，尽管因朗诺将军的政变，柬埔寨本地华文教育之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柬埔寨境内的所有华文学校都已被迫全部停止办学。事实上，华文教育被柬埔寨官方公开正式禁止后，一方面，在朗诺将军控制的金边等城市，华文学校虽被迫关闭，但部分华校教师通过此前与学生及家长建立的私人关系，转入“地下”，继续“在家里偷偷地讲授华文”（杨豪 1999：2），甚至朗诺将军政权中部分国会议员、军队将领亦“秘密聘请华文教师”为其子弟教授华文。²¹另一方面，在“赤柬”与西哈努克亲王等组成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控制的东部“解放区”等地，由于其一直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支持，与中国大陆关系良好（李晨阳 2005：92-93），因而上述地区的华文学校非但得以继续开办，且学校“左翼”色彩明显。²²在中国大陆等的影响下，这类地区一度甚至掀起了兴办华文学校的热潮，几乎连最偏僻的小乡村也办起了华文学校（周聿峨 1995：374），由此短时间内华文教育在此类地区之发展亦呈现出欣

²¹ 作者于2018年2月18日对柬埔寨金边客属崇正学校校长周洁明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大金欧（Takhmau）周宅。录音编码：008。

²² 作者于2018年2月16日对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前副会长、文教师训处主任郑棉发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郑宅。录音编码：007。

欣向荣之势。直至1974年前后，“赤柬”等在柬埔寨境内占有军事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²³建立起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政权，推行“极左”排华“红色恐怖”后，这类华文学校才被迫停止办学，柬埔寨华文教育也因此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重创。

与柬埔寨华人社会整体命运类似，在1975-1979年“赤柬”占领金边等地，统治全柬期间，为实现其对柬埔寨社会的全方位“原子化式”之控制（Kiernan Ben, 2008），在得到毛泽东与中国大陆方面的默许后，“赤柬”以“红色革命”之名义，对此前主要在柬埔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本地华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与“肉体消灭”（王晓林 2008：69-74），这不但使得柬埔寨华人社会遭到空前的劫难，华人商店与产业被没收，大量华人或被“屠杀”或被“流放”至乡村丛林从事集体劳作，部分华人则被迫逃往国外（施益平 1984：26），华人人口由60年代末期的50余万降至30万左右（邢和平、彭晖 1997：33）。同时，本地华文教育也陷入“绝境”。华人不但在公开场合被禁止使用中文交谈，即便在家中使用华语，亦可能会被怀疑为搞特务活动而遭批捕（齐坚 1999：52）。许多此前来自中国的老华人因未学会高棉语，不得不被迫装聋作哑，部分掌握少量华文知识的新生代华人，由于长期面临外部环境的压制，多数被迫放弃华语学习，仅有“少数极个别的父母向子女私下传授华文”，柬埔寨华文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²⁴

柬埔寨华文教育深陷“低谷期”的“悲惨”境遇得到部分调整与改善，出现于1979年越南进攻柬埔寨，“赤柬”势力退出金边等柬埔寨主要城镇以后。由于从1975年前后开始，越南获得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胜利，实现南北两越统一后，其先后与苏联、老挝等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老友好合作条约》，并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加紧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1978年12月，越南黎笋（Le Dung）政府以百春大屠杀（Ba Chuc Massacre）、“赤柬”军队曾入侵富国岛（Phu Quoc Island）为借口，发动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1979年1月，越军攻占金边，此后“赤柬”军队退至泰柬边境，越南方面则支持反“赤柬”势力韩桑林（Heng Samrin, 1934-）等成立了亲越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尼古拉斯·塔林 2003：497-498）。

此后，尽管韩桑林政权出于地区国际局势特别是与越南、中国等关系的考虑，一度在对待华人问题上继续采取了“限制”与“排斥”的态度，并曾专门颁布出台了《351通知》以对华人进行政治“甄别”（高斌 2003：58）。不过，由于其整体上对之前“赤柬”的极端做法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柬埔寨国家由此得以重新回到正轨，这也使得在“赤柬”红色恐怖下受到高度压制的华人社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不但韩桑林政权的“排华”政策遭到暗中抵制，²⁵华人“地下经济”得以重新产生并实现初步发展（谢

²³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到1974年前后，“赤柬”控制的区域和游击区面积已占柬埔寨国土的85%，人口占柬埔寨全国的80%左右（余春树 2014：69）。

²⁴ 作者于2018年2月14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梁振辉副会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广肇学校会客室。录音编码：004。

²⁵ 另有相关人士认为，韩桑林政权的“排华”政策，主要是“做给越南人看”，系典型的“明排暗不排”的做法。见作者于2018年2月14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梁振辉副会长进行访问记录，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广肇学校会客室，录音编码：004。

莞茜, 2013), 华文报纸由越南等地流入柬埔寨(张俞 1992: 52), 甚至部分本地“华人华侨更是不顾风险, 开始在简陋的街道里巷、家庭阁楼里, 悄悄地办起了华文补习班”(杨豪 1999: 2), 柬埔寨华文教育可谓初显复苏迹象。

到1980年代中后期, 越南共产党内亲苏派领袖黎笋(Le Duan, 1907-1986)去世, 亲华派势力长征(Truong Chinh, 1907-1988)等人重获党内大权。同时, 苏共新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 1931-)上台执政后推行“新思维”改革, 苏联逐步从阿富汗(Afghanistan)等地撤军, 放松了对附属社会主义同盟国家的控制, 并积极改善与中共方面的关系(左凤荣 2005: 42-46)。由于国际地区局势再度发生变化, 1986年12月, 越共“六大”召开后, 越南方面决定全面调整内外政策, 缓和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逐步从柬埔寨撤军, 并停止了此前迫害与驱赶华人的做法, “重新评价并注意发挥华人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李绍辉 2010: 66)。受越南方面政策调整与国际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 柬埔寨国内较为务实、中立的洪森(Hun Sen, 1952-)逐步掌握了政权, 出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 柬埔寨政府亦努力调整同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及国内的华人政策, 废除了歧视华人的《351通知》, 放宽了对华人的管制, 允许华人自由从事工商业等活动, 并对此前的计划经济政策等进行了改革, 鼓励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的发展(辛·托拉克 1994: 48)。

由于地区国际局势以及柬埔寨国内政治等发生重大变化,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柬埔寨华人长期受到“压制”、“排斥”的地位处境此时开始明显出现好转(龙登高 1994: 18), 大量华人从乡村、国外返回柬埔寨及各大城镇后, 遂将其此前已悄然自行恢复的“地下经济”逐步公开化与合法化。²⁶与此同时, 他们更抓住柬埔寨国内经济政策改革调整的机会, 积极利用此前积累的“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 通过与柬埔寨国家干部“合作做生意”, 收购“经营管理不善的柬埔寨国营企业”(廖小健 1996: 37), 以及投资进出口贸易、金融、房产、旅游产业等(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 2014: 22), 迅速恢复并扩充其在本国工商业领域与经济上的地位及实力。柬埔寨华人社会因此也得以逐步恢复元气。

随着柬埔寨华人地位的逐步恢复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重现生机与活力, 主要依靠华人社会发展的本地华文教育, 也因柬埔寨政府此时的“放任”态度, 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²⁷从1986年前后开始, 柬埔寨各城镇乡村中, 不但华人教师私设的“家庭华文补习班”数量与就读学生人数不断增加,²⁸台湾方面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在柬埔寨金边等地开设的“佛堂”更是公开为门徒信众提供“免费汉语教育”(许梦琳 2016: 9)。到1980年代末期, 冷战结束前后, 由于柬埔寨华人经济经过数年时间的恢复与发展, 已成为柬埔寨国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之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逐步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对外“输出革命”政策, 与柬埔寨政府官方关系有所调

²⁶ 作者于2018年2月12日对柬埔寨《星洲日报》主编王渐鸿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星洲日报》办公室。录音编码: 001。

²⁷ 作者于2018年2月19日对柬埔寨客属会馆曾广荣副会长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客属会馆办公室。录音编码: 009。

²⁸ 作者于2018年2月18日对柬埔寨金边客属崇正学校校长周洁明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大金欧(Takhmau)周宅。录音编码: 008。

整（许梅 2005：46-47），柬埔寨全国“团结保卫建设祖国统一阵线”主席谢辛（Chea Sim, 1932-2015）亲王更是亲自找到本地华人领袖，向其公开表态，柬埔寨政府不但鼓励华人在工商业领域的发展，且同意并支持华人“恢复办华文学校，恢复传统宗教活动和过年过节庆典。”（柬华理事总会 2003：62、72）此后，本地华人社会遂公开积极努力于华文学校的重建与恢复工作，柬埔寨华文教育在遭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20余年的“压制”后，终于再度步入重建与复兴之路（柬华理事总会 2010：66），这也为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恢复与再次“蓬勃发展”预埋下了伏笔。

六、结语

无论对柬埔寨国家，亦或是对柬埔寨华人社会，还是对柬埔寨华文教育而言，1990年代初，冷战的终结，都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由于地区国际局势日益缓和，在此之后，虽然柬埔寨国内尚有外部势力支持的“赤柬”余部之“反叛”活动以及“依附”于各主要地区国际大国的内部政治势力之间的权斗，并一度引发不小的冲突，但总体上而言，柬埔寨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内政也基本再少受到外部国际地区势力的严重干扰，而走上了相对和平、自主的发展道路（乔·布林克里，2016）。受益于此种内外条件的好转，柬埔寨华人社会与柬埔寨华文教育也实现了相对较为平稳且健康的发展。

当然，尽管如此，却不得不指出的是，作为一套与柬埔寨以外华人国家地区关系密切，且起着延续“他者”族裔文化价值观念的外侨教育功能体系，柬埔寨华文教育在“后冷战”时期，虽已随着柬埔寨华人整体上融入本地社会，而主动提出并开展实施了“中柬双语教育”、“融入柬埔寨国家教育体系”等策略，同时各华文学校也开始积极接纳高棉等外族子弟前来就读，以积极努力配合于柬埔寨国内文教事业的发展（盘世卫，2017）。然而，与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情况类似，“后冷战”时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命运，仍然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受国际地区局势变化，尤其受到中柬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等影响。²⁹不过，无论如何，已然成为柬埔寨内部事务（也是事业）的柬埔寨本地华文教育，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已不再是源自外部世界的变化与冲击，而更多的表现为随着柬埔寨国内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得不亟待解决办学模式调整，市场机制引入导致的学校内部竞争、分化，以及不同区域间学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³⁰而这也亟待后来者予以关注并加强研究。

参考文献

- 白昱，2008，〈柬埔寨华文教育状况综述〉，《国际汉语教育》，第2期，页20。
班固，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页1670。
别必亮，2001，〈近代国内华侨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史学月刊》，第5期，页62-68。

²⁹ 作者于2018年2月12日对柬埔寨《星洲日报》主编王渐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星洲日报》办公室。录音编码：001。

³⁰ 作者于2018年2月14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梁振辉副会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广肇学校会客室。录音编码：004。

- 别必亮、田正平, 1997, 〈近代华侨教育的历史考察〉,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 页36。
- 蔡昌卓, 2010, 《东盟华文教育》,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46。
- 蔡振裕, 〈东南亚华人系列报道: 学生四万名冠全球, 最大华文学校在金边〉, 《星洲日报》, 2001年3月23日, 第6版。
- 陈碧笙, 1983, 〈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 第4期, 页155。
- 陈世伦, 2016, 〈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 张禹东、庄国土主编,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三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28、34-35。
- 陈世伦, 2017, 〈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 《东南亚研究》, 第5期, 页120-138。
- 陈元靓, 2011, 《事林广记》,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David Chandler 2007. *A History of Cambodi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pp. 201-206.
- David J. Steinberg 1957. *Cambodia: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Inc. pp. 159.
- Douglas P. Murray 1964.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20.
- 杜敦信、赵和曼, 1988, 《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 北京: 时事出版社, 页323。
- 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编委会编, 2014, 《柬埔寨潮州会馆下辖端华创校百年纪念特刊: 1914-2014》, 金边: 端华学校, 页4、6、10、12、18、22、30、34、41。
- 方天建、何跃, 2013,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大国战略调整述评〉, 《世界地理研究》, 第3期, 页30-40。
- 傅曦、张俞, 2000, 〈柬埔寨华侨华人的过去与现状〉, 《八桂侨刊》, 第3期, 页34。
- 符气志, 2013, 〈柬埔寨华文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 第2期, 页137-139。
- 高斌, 2003, 〈1980年代末以来柬埔寨华人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 《南洋问题研究》, 第2期, 页58。
- 郝彦忠, 2000, 〈柬埔寨华文教育全面复苏〉, 《海内与海外》, 第5期, 页66。
- 洪群, 2003,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华校融入国家教育体系〉,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第4期, 页16-19、72。
- 侯瑜, 2006,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侨务工作研究》, 第4期, 页16。
-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1998,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页94。
-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1960, 《华侨志——柬埔寨》, 台北: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 黄明焕, 2006, 《战后印支三国华文教育研究》, 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页10。
- 黄雄略, 1944, 《柬埔寨志略》, 南京: 中正书局, 页3。
- 霍尔, 1982, 《东南亚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页519-527。
- 柬华理事总会, 2003, 《柬华理事总会成立十三周年纪念特刊》, 金边: 柬华理事总会, 页62、72。
- 柬华理事总会, 2010, 《柬华理事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金边: 柬华理事总会, 页66。
- 柬华理事总会文教组, 1994, 《柬埔寨华文教育概况》, 金边: 柬华理事总会, 页1。
- 柬埔寨潮州会馆, 2014, 《柬埔寨潮州会馆成立20周年纪念特刊(1994-2014)》, 金边: 柬埔寨潮州会馆, 页215。

- 柬埔寨潮州会馆公立端华学校, 2016, 《柬埔寨潮州会馆公立端华学校概况》, 金边: 柬埔寨潮州会馆公立端华学校, 页1。
- 柬埔寨民生中学编, 〈柬埔寨福建会馆简介〉, <http://www.fujianms.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3-2012-04-03-04-51-06>, 2012年4月3日。
- 柬埔寨民生中学编, 〈民生中学简介〉, <http://www.fujianms.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2-2012-04-03-04-58-11>, 2012年4月3日。
- 柬埔寨铁桥头柬华理事会华明学校编, 2016, 《铁桥头柬华理事会、华明学校概况》, 金边: 柬埔寨铁桥头柬华理事会华明学校, 页1。
- 江河, 1996, 〈柬埔寨的华文教育〉, 《八桂侨史》, 第1期, 页26。
- 康矛召, 2000, 《外交官回忆录》,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页177-178。
- 科大卫, 2009,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Kenton Clymer 200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From Curiosity to Confrontation*. Routledge. p. 20.
- Kiernan Ben 2008. *The Pol Pot Regi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孔飞力, 2016,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晨阳, 2005, 《柬埔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92-93。
- 李国卿, 2000, 《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231-232。
- 李绍辉, 20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挝、柬埔寨华人社会发展探析〉, 《南洋问题研究》, 第2期, 页62、66。
- 黎庄, 1958, 《柬埔寨华文教育》, 台北: 华侨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 页16、94-96。
- 梁明, 1988, 《高棉华侨概况》, 台北: 正中书局, 页39。
- 廖小健, 1996, 〈柬埔寨华侨华人政策的发展变化〉, 《东南亚研究》, 第6期, 页37。
- 林志忠, 2008, 〈近百年来柬埔寨华校教育发展之探讨〉, 《台湾东南亚学刊》, 第5卷第2期, 页3-34。
- 刘海棠, 〈柬埔寨华文教育历史〉, <http://edu.asean168.com/a/20150316/3295.html>, 2015年3月16日。
- 刘舒凌, 〈柬华文学校在探索中行进——访柬华理事总会吴朝文先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1月28日, 第5版。
- 刘真, 1973, 《华侨教育》, 台北: 中华书局, 页180。
- 龙登高, 1995, 〈沧桑巨变二十年——世界各地印支华人经济述论〉,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4期, 页18。
- Michael Vickery 1986. *Kampuche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pp. 23-24.
- 尼古拉斯·塔林, 2003, 《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页497-498。
- 罗杨, 2017, 〈“香火”永续: 柬埔寨华人社团百年变迁〉, 《南洋问题研究》, 第4期, 页62-63。
- 盘世卫, 〈柬埔寨华文教育调研报告〉, <http://www.hwjyw.com/teachers-window/content/2017/07/03/34124.shtml>, 2017年7月3日。
- 潘一宁, 2010, 〈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柬埔寨中立的干涉(1956-1971)〉, 《南洋问题研究》, 第1期, 页25。
- 齐坚, 1999,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炎黄春秋》, 第9期, 页52。
- 乔·布林克里, 2016, 《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家》,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清飏, 2001,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5期, 页151-156。

- 全裕辉, 2004, 〈柬埔寨的华人〉, 《东南亚纵横》, 第10期, 页30。
- 余春树, 2014, 《柬埔寨——迈进和平发展新时代》,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页69。
- 施益平, 1984, 〈苦难的柬埔寨华人〉, 《华人》, 第11期, 页26。
- 史如林, 1985, 〈柬埔寨华侨史研究在中国〉, 《东南亚纵横》, 第2期, 页44。
- Shihlun Allen Chen 2015.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Hawaii: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pp. 229.
- 斯波信义, 2012,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苏子, 1954, 《新生的高棉》, 香港: 自由出版社。
- 苏子, 1959, 《柬埔寨华侨志》, 台北: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页31-32、111。
- 孙广圻, 1984, 〈宋代航海技术综论〉, 《中国航海》, 第2期, 页69-81。
- 孙华, 1988, 〈缅怀柬华文化园丁——纪念柬埔寨浩劫十三周年〉, 《华人》, 第4期, 页16。
- 谭实, 1985, 《柬埔寨》,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页195-196。
- 谭晓健、余建忠, 2006, 〈柬埔寨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 第3期, 页26。
-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 1990, 《新中国外交风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页59。
- 王士录, 1994, 《当代柬埔寨》,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页113。
- 王士录, 2002, 〈柬埔寨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4期, 页49-50。
- 王文元, 1979, 《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关系——经济地理研究》, 昆明: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页17-18。
- 王晓林, 2008, 〈波尔布特: 并不遥远的教训〉, 《炎黄春秋》, 第4期, 页69-74。
- 威·贝却敌, 1958, 《沿湄公河而上——柬埔寨和老挝纪行》,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页6。
- 温北炎, 2003, 〈柬埔寨政治经济发展与华人经济〉, 《东南亚研究》, 第3期, 页53。
- Willmott W. E. 1967.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ublications Centre. pp. 79-80.
- Willmott W. E. 1970.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pp. 6, 11.
- 吴凤斌, 1993, 《东南亚华侨通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页61。
- 西哈努克, 1997,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页161-164。
- 西莫尼亚, 1963, 〈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居民〉,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第1期, 页17。
- 夏诚华, 2014, 〈柬埔寨华语语文教育现况〉, 《侨教与海外华人研究学报》, 第4期, 页27-42。
- 肖寒, 2012, 《柬埔寨民生中学“半日制”华文教学模式考察》, 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辛·托拉克, 1994, 〈对柬埔寨经济的看法〉, 《东南亚纵横》, 第2期, 页48。
- 邢和平、彭晖, 1997,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过去和现在〉, 《东南亚纵横》, 第2期, 页33。
- 谢莞茜, 〈杨启秋: 柬埔寨华文教育领头人〉, <http://news.hexun.com/2013-01-30/150766928.html>, 2013年1月30日。
- 徐承恩, 2015, 《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香港: 圆桌文化出版社。
- 许梅, 2000, 〈战后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发展〉, 《东南亚研究》, 第1期, 页12。
- 许梅, 2005, 〈柬埔寨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柬关系的发展〉, 《当代亚太》, 第3期, 页46-47。
- 许梦琳, 2016, 〈柬埔寨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现状调查与研究〉, 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页9。

- 许永璋, 2004, 〈朱应、康泰南海诸国之行考论〉, 《史学月刊》, 第12期, 页25-30。
- 许肇琳, 1982, 〈十七至十九世纪下柬埔寨的华侨〉, 《东南亚历史学刊》, 第1期, 页127。
- 许肇琳, 1995, 《柬埔寨》,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页296。
- 杨豪, 1999, 《柬埔寨华文教育》, 金边: 柬华理事总会, 页1-2、13、17-18。
- 野泽弘弘, 2012, 〈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华文教育的复兴与发展〉, 《南洋资料译丛》, 第3期, 页66。
- 郁汉良, 2001, 《华侨教育发展史》, 台北: 国立编译馆。
- 翟强, 2013, 〈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1954-1965)〉, 《南洋问题研究》, 第1期, 页14。
- 张西平, 2009, 《世界汉语教育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页290。
- 张文和, 1956, 《越南高棉寮国华侨经济》, 台北: 海外出版社, 页107。
- 张俞, 1992, 〈柬埔寨华人生活开始好转〉, 《八桂侨史》, 第2期, 页52。
- 张俞, 2002, 《老挝柬埔寨越南华侨华人漫记》,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页166。
- 张悦, 2012, 《柬埔寨的华教社团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和曼, 1981, 〈古代的中柬贸易〉, 《学术论坛》, 第3期, 页70-71。
- 周达观, 2000, 《真腊风土记·异事》, 北京: 中华书局, 页178-181。
- 周胜皋, 1969, 《海外华文学校教育》, 台北: 侨务委员会, 页87-88。
- 周聿峨, 1995, 《东南亚华文教育》,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页374。
- 周中坚, 1985, 〈华侨移居柬埔寨的过程及其历史原因〉, 《学术论坛》, 第8期, 页71。
- 周中坚, 1996, 〈战后五十年柬埔寨华人的曲折历程〉, 《南洋问题研究》, 第1期, 页25。
- 周中坚, 2003, 〈柬埔寨华侨华人史主要事件述略〉, 《东南亚南亚研究》, 第4期, 页49。
- 朱彧, 2007, 《萍洲可谈》, 北京: 中华书局。
- 庄国土, 1990, 〈晚晴政府的兴学措施与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3期, 页23。
- 庄国土, 2004, 〈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南洋问题研究》, 第3期, 页2。
- Zuo Fengrong 1970.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pp. 6, 11.
- 左凤荣, 2005, 〈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调整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探索与争鸣》, 第10期, 页42-46。

访谈资料

- 作者于2018年2月12日对柬埔寨《星洲日报》主编王渐鸿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星洲日报》办公室。录音编码: 001。
- 作者于2018年2月13日对柬埔寨金边端华中学校长杨金义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端华中学校长办公室。录音编码: 002。
- 作者于2018年2月13日对柬埔寨客属会馆罗世兴会长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客属会馆办公室。录音编码: 003。
- 作者于2018年2月14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梁振辉副会长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广肇学校会客室。录音编码: 004。
- 作者于2018年2月15日对柬埔寨广肇会馆蔡迪华会长进行访问, 地点为柬埔寨金边蔡宅。录音编码: 005。

作者于2018年2月15日对柬埔寨（中国）广东商会秘书长郑汉贵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蔡宅。录音编码：006。

作者于2018年2月16日对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前副会长、文教师训处主任郑棉发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郑宅。录音编码：007。

作者于2018年2月18日对柬埔寨金边客属崇正学校校长周洁明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大金欧（Takhmau）周宅。录音编码：008。

作者于2018年2月19日对柬埔寨客属会馆曾广荣副会长进行访问，地点为柬埔寨金边客属会馆办公室。录音编码：009。